

论作为学术思潮的观念史研究方法

崔存明

(北京印刷学院 社会科学部, 北京 102600)

摘要: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观念史研究方法逐渐渗透到文学、史学和哲学诸领域, 形成一个较大的学术研究思潮。由于以美国的洛夫乔伊和英国的斯金纳为代表的观念史研究专家的不懈努力, 观念史研究成果使各学科摆脱近代以来被科学主义思潮切割分裂的状态, 以某种新的方式实现新的整合成为可能。观念史研究方法对中国学术的影响经历了几个阶段: 先对文学研究, 接着对历史学研究, 然后对哲学研究产生影响。

关键词: 观念史; 研究方法;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26(2011)03-0025-05

Researching Method of History of Ideas as a Academic Trend of Thought

CUI Cun-m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Beijing 1026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no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researching method of History of Ideas has been developing into a big academic trend of thought by gradually penetrating into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the persistently effort of the experts of history of ideas such as Mr. Arthur O Lovejoy from American and Mr. Quentin Skinner from England, the achievement of History of Ideas has made it is possible for every subject to get rid of the state of fission that has caused by the scientific trend of though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times, and to realize an new integration through a new method. The effect of researching method of history of ideas to Chinese academy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stages: firstly to the Literature, the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the last.

Key words: history of ideas; researching method; effect

近代以来, 观念史研究方法方兴未艾, 而且有形成一个较大的学术研究思潮的趋势。特别是近 20 年以来, 从港台到大陆, 许多学科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某种程度上采用或吸取这一方法进行本学科的研究, 且都取得了具有革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 什么是观念史的研究方法?

其历史演变、使用范围如何? 观念史研究方法已经和将要对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是我们把握这一学术思潮首先要进行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一、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兴起及其对西方学术研究的影响

学术界一般认为, 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概念最早起源于法国启蒙运动, 而观念史的研究则在 19 世纪末才出现。这一时期观念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阿克顿和德国的狄尔泰。真正使观念史作为一个学科得以确立起来的人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哲学教授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1940 年, 观念史研究的专门刊物——《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创刊。以此为标志, 观念史研究在美国率先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学科。

有人把“History of Thought”(柯林武德用语)、“Intellectual History”(斯金纳、拉卡普拉及后当代作家用语)同洛夫乔伊的“History of Ideas”当作相同的范畴进行整体考察, 这就把观念史同思想史相等同。同时, 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柯林武德可以算作思想史研究的开拓者, 但他的观点并不被洛夫乔伊吸纳, 而是在数十年后得到斯金纳和拉卡普拉的些许回应; 洛夫乔伊则怀着推动跨学科学术史研究的理想, 倡导一种以‘内在’方式为主导的‘观念史’研究, 他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 遇到了斯金纳的批评和拉卡普拉的反思。”^[1]

我们认为, 观念史是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方法而存在的, 在其产生的初期, 并不能同思想史相等同, 只能算作思想史中的一个分支。但是, 在其产生之后, 特别是由于洛夫乔伊的杰出贡献, 使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之后,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影响不断扩大, 逐渐渗透到文学、史学和哲学诸领域, 因此目前的观念史研究方法又不能只限定

收稿日期: 2011-03-09

于思想史乃至历史学这样单一的学科范围内。这也是本文在后边要进行探讨的,即思考观念史研究方法在各学科研究中的应用问题。下面,我们主要通过两位代表人物:美国的洛夫乔伊和英国的斯金纳的学术观点进行分析,从而对观念史研究方法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的特点进行初步的归纳与整理,以利于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借鉴与应用。

(一) 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

我们在探讨观念史研究的时候,首先要从洛夫乔伊的观点入手。了解洛夫乔伊的学术贡献的文本依据则是他本人出版于1936年的《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一书。正是在这部书中,洛夫乔伊教授提出了著名的“观念单元”(unit Ideas)概念^①。在该书的“导言”中,他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存在一些基本的、对西方思想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观念单元”,这是“一些含蓄的或不完全清楚的设定,或者在个体或一代人的思想中起作用的,或多或少未意识到的思想习惯”^[2],而这正是观念史研究的基本单元。洛夫乔伊提出这个“观念单元”的意义在于,他认为这些东西由于已经固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成为日常行为特别是思想的习惯,因此就常常是“不言自明”的和“心照不宣”的,因而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无形之网,束缚了人们思想的前进。所以,他要对这些“常识”性的观念单元做历史性考察,这就是观念史的工作。具体的研究原则,洛夫乔伊提出四条:

“第一,穿越不止一个历史领域,最终实际上是穿越全部历史领域,即观念单元以各种重要性出现于其中的那些无论是被称为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还是政治的历史领域,去追溯历史学家如此离析出来的每一个观念单元。

第二,观念史研究表达了一种抗议,即对由于各种民族和语言所造成的对文学以及某些别的历史研究的传统划分所产生的结论的抗议。

第三,特别关心在大量的人群的集体思想中的那些特殊观念单元的明晰性,而不仅仅是少数学识渊博的思想家或杰出的著作家的学说或观点中的观念单元的明晰性。

第四,作为观念史的最终任务的一部分就是运用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试图理解新的信仰和理智风格是如何被引进和传播的……如果可能的话,则弄清楚那些占支配地位或广泛流行的思想是如何在一代人中放弃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而让位于别

的思想的。”^[3]

由于对于上述观念史四个特点的概括是洛夫乔伊在一次演讲中提出来的,所以其语言风格偏口语化。为了方便理解,葛兆光简单地概括为“观念的传播和延续不限于一个历史时代、历史领域和民族国家,因此,观念史讨论的话题常常超越朝代、国界和语言,拥有更大的时间与空间,它拒绝从国籍和语言上切割对象,把自己拘束在狭小的政治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中,它必须考虑超出国界的东西”^[4]。其中,第四个特点的概括对于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有更大的启示。因为这是对传统的历史研究往往聚集于精英人物的状况进行了反思,同时提出注重一般民众的历史作用的思想。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历史发展特点,起到了补充传统研究方法之不足的革新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与革新并重的思路指导下,洛夫乔伊在《存在巨链》一书中从西方文化中以“存在”为代表的关键性观念入手,讨论其穿越历史古今的演变规律,为观念史研究新方法做了示范。

洛夫乔伊的方法对美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后也对亚洲的历史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近代史学研究以注重观念探讨见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单一概念的精细考证似乎成为日本史学界,特别是日本汉学研究中的一个拿手好戏。我们认为日本近代学术研究的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影响。

观念史研究方法也对欧洲学术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观念史研究方法对欧洲的影响表现为一种双向互动式的特点。即在影响欧洲学术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受到欧洲学术方法的反作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欧洲学术界所发扬光大。欧洲学者对观念史研究的促进主要以剑桥学派为代表,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上文提到过的昆廷·斯金纳和拉卡普拉。这里我们主要对斯金纳的观点加以分析。

(二) 斯金纳对观念史研究方法的推进

众所周知,剑桥学派是以研究政治思想史闻名于世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在对传统的政治思想研究过程中,对以往一些看似根深蒂固的观念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反思,从而发现长期以来形成的支配人们普遍思维的一些观念常常不是其最初

^① 张传有,高秉江译《存在巨链》一书中,“unit Ideas”被译为“单元——观念”,我们在这里译为“观念单元”。

的本意,而是被后世不断加工和修饰后形成的。这样,他们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对一些重要的传统观念进行了重新的评价,从而使某些传统观念焕然一新,比如他们对洛克思想的重新认识、对马基雅维里思想的重新疏解、对霍布斯思想的反思等等。

学术新成果的取得,往往源于新方法的应用和新材料的发现。剑桥学派创新的要点,就在于他们对研究方法的革新。这个方法的革新,主要是以斯金纳为代表,对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和推进。简要地概括就是,洛夫乔伊注重“观念单元”经历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在演进规律的探索,从而归纳出跨时代、跨区域和跨文化的共同价值元素。这对于打破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思潮导致的学科分割所带来的学术研究视野日渐狭窄与封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洛夫乔伊的方法强调贯通,强调“穿越全部历史领域”,就会让人们在摆脱学科束缚的同时,无形中忽略具体的时代背景对历史事件的影响。斯金纳正是看到了这一方法的不足,从而提出了观念史的另一不同的方法——“历史语境”方法。在斯金纳看来,任何观念都有其产生时的特定的条件与环境,而这些是不能流传的,后来的认识都是在后来者所处的语境下对原作者的理解,因此是有偏差的。研究者的工作是破除后人不断增加的解释方式所造成的对原作者的不准确理解,尽量还原原作者当时的语境,从而最大限度地求得接近于原初的观念。斯金纳的许多突破性成果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取得的。比如,他为了对经典著作中的典型人物求得新的认识,就要对其所生活时代的背景重新加以全面的分析与把握,因而一反注重社会精英思想研究的传统模式,扩大思想背景和取材范围,将一般民众的思想也纳入到考察视野中,从而使他所还原的语境更加丰满和接近于原貌。斯金纳的这一方法实际上是对洛夫乔伊所提出的观念史研究四个特点中的第四点的继承与发展。斯金纳本人也成功地应用这一思路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比如“从对于马基雅维里和文艺复兴时期自由观念的追溯,发掘出了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斯金纳本人也因其对于‘自由’等问题的考察和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等层面的思想贡献,在其思想家的地位之外,也成为当代政治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家。”^[5]

经过斯金纳的推动,观念史研究方法形成了以历史分析见长的“观念单元”方法和正本清源见长的“历史语境”方法相互补充的状况。其贡献,首

先表现在他在继承洛夫乔伊方法的基础上,反思长期存在的以精英思想为叙事主体的思想史研究,提倡平民思想史的写作。这样就促进了思想史学科的丰富和完善。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从观念史所提供的启示来看,平民思想史的写作在展现了作为历史数量主体的人民真实的生活历程的同时,也使精英阶层的生活背景日益清晰,从而为更加清晰和全面地理解其思想提供了生动的背景知识。

观念史的研究方法在对历史学研究产生影响的同时,也逐渐地在文学领域和哲学领域以及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认为,在上个世纪后半期盛行的解释学以及解构主义,从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吸收了观念史方法的一些成果,至少是相互借鉴的。总之,经过观念史研究专家及更多人的不懈努力,使该方法成为各学科的研究可以共同参考的文化资源,对人文学科在近代以来被科学主义思潮所导致的分裂状态,以某种新的方式实现新形式的整合成为可能。

二、观念史研究方法对国内学术研究的影响

观念史研究方法对中国的学术研究的影响体现出一种分学科、分阶段的特点,即在某一阶段主要对某一个学科领域产生影响。具体来说,观念史研究方法首先对文学研究,特别是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然后,对历史学,特别是思想史的研究产生影响;接着对哲学研究产生影响;最新的动向是,这一方法开始在广义的社会文化层面引起社会的关注。

(一) 观念史研究方法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

观念史研究方法对中国学术最早产生影响的领域,应该是中国文学研究。而且这种影响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扩展到史学、哲学和文化领域,但是直到当前,它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依然没有一点减弱的迹象,反倒日益加强。今天,在文学研究领域中日益成为热潮的“关键词”(Keyword)研究,正是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独特表现形式^{①[4]}。

关于文学领域中以“关键词”研究热潮为特点的观念研究方法的应用,陈平原先生曾撰文加以专门论述^[6]。陈先生主要从传统学术史的范畴考察了文学和史学领域的“关键词”研究热潮,为我们

^① 葛兆光也认为“‘关键词’(Keyword)研究,如果它追溯历史,那么笼统一点说,也是观念史的研究嘛。”

提供了观念史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宏观轨迹。其中,对文学领域特别是文艺理论研究中的论述尤为详备。根据陈先生的研究,英美新批评早期代表人物瑞恰慈和燕卜苏对中国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在对陈先生文章做进一步的分析后认为,瑞恰慈和燕卜苏所带来的方法与观念史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我们提出几点新的思考:

首先,瑞恰慈和燕卜苏在来到中国之前是否接受了观念史的方法。或者说他们二人本身是否有可能是观念史方法创新的参与者,因为在他们来中国讲学的时候,特别是瑞恰慈在华期间(1929年—1931年),其著作早已出版,而这个时候,洛夫乔伊的《存在巨链》尚未出版(该书是在1935年出版)。

其次,陈先生通过对瑞恰慈、燕卜苏以及以朱自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特点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他们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所使用的文学批评手法,几乎与我们上文所述的观念史研究方法如出一辙。这就留给我们广阔思考空间。

最后,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陈先生还认为“关注‘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这一研究策略,不见得非从瑞恰慈和燕卜苏那里拜师学艺不可,传统中国学术也有类似的思路”。对于这一观点,作者举了朱自清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1年版)中就体现出对旧有观念进行反思的思路,而且说明这不一定是受了瑞恰慈和燕卜苏的影响。

这样看来,他又将这一话题引向了更广泛的中西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比较上来,引发我们更深入地思考的同时,也必将使我们联想到这一方法将扩大影响,触及史学乃至更广泛的学科领域。

(二) 观念史研究方法对国内哲学、历史学及文化研究的影响

近代以来,东西方学术界对新方法的引进往往都是由文艺理论界开风气之先。比如学术界对德里达学说的接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在中国,学术界对观念史研究方法的接受,同样也是如此,即先由文艺理论研究者率先应用,然后再扩大到其他学科。时至今日,其影响几乎渗透到文、史、哲等所有的人文、社科领域。

观念史研究方法对史学研究与哲学研究发生影响的起始时间较早,其特点往往是对哲学与史学(特别是思想史,当时与哲学史并无明确的学科区分)同时发生影响。根据陈平原的研究,胡适《戴

东原的哲学》^[7]、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8]可以看作是广义的观念史研究成果。这里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胡适揭橥这一方法是在1923年,这时距胡适1917年美国留学归来已经有7年时间,而距洛夫乔伊的代表作《存在巨链》1935年公开出版尚有12年时间。那么,胡适是否受到了国外观念史研究思潮的影响呢?毕竟,胡适曾经于1910年—1917年在美国经历了长达7年的留学生活,而且他还是一个对时代潮流嗅觉特别敏锐和超前的人,因此才能在回国后,不断引领国内思想界的新潮流。他作为时代潮流的先知先觉者,是否同西方的观念史家一样,几乎同时达到了同样的理论自觉?正如陆九渊所谓“东南西北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观念史研究方法对中国的文史学界发生全面影响的时期应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总的特点是:先从文艺理论界到史学界,然后从史学界到哲学界,最后再到大众文化界。按照这样的演进途径,观念史研究方法影响不断扩大,到今天几乎形成了一种学术思潮。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钱穆先生的《晚学盲言》一书可能也是受这一思潮影响的产物。在我们看来,该书是应用观念史方法取得的杰出成果。该书是“作者在86岁时患眼疾以致目盲不能视人,罔论读写的情况下,自己口述,夫人笔记,然后口诵耳听,一字一句修改订定。终迄时已92岁高龄,爰题曰《晚学盲言》。……主旨为中西文化传统之异同。”^[9]本书成稿于1986年。全书选出中国文化中的90个代表性概念,进行逐一梳理,且是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进行的。这是钱先生晚年的重要作品,显示出其对学术发展潮流的深刻理解和领悟。

也正是在钱先生著作问世的前后,中国的文史学界特别是以港台地区为代表,逐渐形成运用观念史方法推进学术研究的风尚。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观念史方法的理解逐渐加深,进入到对传统学术方法与学术观念进行反思与重构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是对传统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精英模式的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精英与民众思想并重的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写作。虽然这一反思最先是梁启超在上世纪初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帝王将相家谱”式的写作提出批判而揭示出来,但真正把反思与重构结合起来,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葛兆光先生的思想史写作可以看作是这一重构过程的重要标志成果。当

然 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成果,不能简单化为观念史的成果。但我们从其最后所达到的效果来看,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观念史方法下对原有精英思想之产生背景的民众思想的重新描述,以求更好地展示一个时代思想之全面状况这一目标。另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流行的文化史研究热潮也正是这一学术研究方法影响下的反思性成果。

进入21世纪以来,观念史的方法更加普遍地应用于文史哲诸学科的研究中。其特点是日益显示出与中国传统训诂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性。所以在当前的历史学特别是思想史,以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以观念史的方法重新对代表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重要概念进行重新训释,以求打破相对较长时期的学术成见,从而推动思想史与哲学史向前发展,成为当前一个较为普遍的学术思潮。当前,以重要的文化观念的历史演变为线索,观念史方法在中国文化界也促成了一种理解历史与文化的全新视角。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种理解方式不仅仅是对中国文化,也包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

三、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学术定位及其启示

观念史研究方法正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方法的思潮,同时也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理解中西方文化特点的思潮。因此,如何对其进行恰当的学术定位,如何把握对它的使用限度,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其学术意义与价值,就成为我们当前所要注意的问题。

(一) 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学术定位

首先要注意观念史与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区分。所谓观念史,是历史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如前所述,它形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由于洛夫乔伊的努力,使这门新生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形成了独立的学科。而观念史研究方法,则是指在观念史研究中逐渐形成的、以对思想观念的考察为主要特点的研究方法。通过这一区分,我们要说明的是,观念史研究方法不仅限于观念史专业本身的范围,而是由于其方法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因而逐渐超出了观念史的学科范围,而被文学、哲学等其他学科所广泛应用,几乎形成了一种影响较广泛的观念史研究方法的思潮。这一点,是我们在理解与应用这一方法时,所必须区分清楚的。

其次,为了进一步准确地掌握和应用这一方法,还要掌握好这一方法的使用限度。所谓使用限

度,就是要针对不同的学科特点,掌握不同的使用分寸。为了处理好这一使用分寸问题,我们还要正本清源,从观念史的学科定位入手,进行分析。这里边,我们要作两个层次的分析:一个是观念史在历史学科中的定位,主要是与思想史的关系;另一个是观念史与哲学史及文化史的关系。关于前者,我们认为,观念史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在西方经常等同于思想史,当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关于后者,我们认为,观念史是介于哲学史与文化史之间的学科。

之所以做这两方面的区分,是为了让我们明白观念史研究方法最初的学科定位背景,从而为我们将其引伸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中,正确地结合应用对象的学科特点进行恰当使用准备了基础知识。例如,将这一方法引入哲学史研究中,我们通过上边的学科定位关系,就要注意结合哲学史的学科特点进行研究,若仍然按照观念史的方法进行研究,就等于把哲学史研究也变成了观念史研究。因此,正确的使用方法是要在区别好两个学科不同特点的前提下,进行各有侧重的研究。比如同样研究一个概念,在哲学史研究中的侧重点与在观念史(思想史)研究中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正如罗格·斯柯鲁顿所认为“哲学史关注的是对哲学结论与观点之内容的描述,而不是对于这些观点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导致这些结论与观点的影响因素的描述。”^①[10]

(二) 观念史研究方法的意义及其启示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其从属于历史学领域的时候就体现出了注重历史的分析与跨学科综合分析的特点。它是针对西方长期以来注重单学科逻辑分析的传统,特别是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重新恢复人文学科所固有的综合分析的特点,从而为人文科学走出科学主义的影响,恢复其本来面目,提供了一种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近年来文史哲等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在自觉与不自觉地观念史研究方法引入本学科的研究中,而且有日渐成为一种潮流的趋

(下转第45页)

① 原文为: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concern is to describe the content of philosophical conclusions and arguments, and not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occurred or the influences which led to them. Roger Scruton. 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M]. London: Routledge, 1993. P2.

步的足迹,从中还能发现介绍人和党支部的工作情况。审阅完这两个C级要素,才能审到预备党员转正申请和预备期小结。有申请才能进入转正程序,而预备期小结则是提出申请的支持材料之一。审阅通过这份材料,才能审阅预备党员转正公示情况登记表。这一系列程序体现了有序性。不审阅教育考察表,就去审阅转正申请和预备期小结,就会因为缺乏根据而无法提出意见;而只限于审阅转正申请和预备期小结,不去审转正公示情况登记表,就无从知晓该同志转正是否得到党内外的认可。

第四,始终坚持动态性。坚持整体性、相关性、有序性,就必然要坚持动态性。因为系统只有在运动中,才表现出整体性、相关性和有序性。高校党委组织员工作要素是一个开放系统。系统与环境发生信息和能量交换,从而具有动态性,使得系统充满生机与活力。这种动态性首先源于在上级党组织与学校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学习、把握党建方面的理论与经验,是引领前进方向的重要保证;在工作中与党内外教职员工的学生的有效交流,以

及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加强和改进自己工作的不竭动力,从而成为学习型群体。由于强化了整体性、相关性、有序性和动态性,所以会有力地推动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深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观和系统理论武装起来的高校党委组织员一定会成为党组织发展党员卓有成效的“报关员”、党的理论和知识的优秀宣传员、富有党性和人文情怀的师长、出色的党务工作人员。我们更深信,在科学发展观和系统理论的指导下的高校党委组织员工作,一定会和祖国现代化事业一样,与时俱进,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2] 高林,陈启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及其应用[J].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王冬冬)

(上接第29页)

势。在此意义上,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应用意义首先是为人文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另一个意义是为学术研究在返本与开新的交替进行中向前发展提供了理论与操作依据。学术的创新往往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开新。观念史研究方法让我们回归经典,以观念单元的清理为切入点,以时代语境的还原以及不同时代语境的穿越与贯通相结合,从而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推陈出新,取得实质性进展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 [1] 丁耘,陈新.思想史研究(第一卷)[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2][3] 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导论[M].张传有,高秉江,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 [4]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5.
- [5] 彭刚.历史地理解思想//什么是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6] 陈平原.学术史视野中的“关键词”(上)、(下)[J].读书,2008(4-5).
- [7] 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8]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9] 钱穆.晚学盲言(封二简介)[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10] Roger Scruton. 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M]. London: Routledge, 1993.

(责任编辑:王冬冬)